

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新华社沈阳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四日电 中共辽宁省辽中县委领导成员，认真看书学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指导实际工作，不断克服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推动了全县革命和生产形势的蓬勃发展。

毛主席教导说：“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辽中县委的领导成员遵照毛主席的这一教导，联系实际认真总结工作。他们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认识到，只有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克服主观主义，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在这个县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县委的一名副书记，在这个问题上体会很深。他在辽中工作以来一直分工领导农业生产，被人们称为辽中的“活地图”。有一次县水利部门根据冷子堡公社的要求，提出要在这个公社的仁合村建设一座电力排水站，他凭自己的老经验，认为这个地区地势北高南低，可以自流排水，使积水流入蒲河，用不着修建排水站。后来，冷子堡公社又多次提出建站要求，他为了说服公社干部，就到仁合村调查，结果发现情况有了新的变化，原来这里下游有些队修了干渠，开发了水田，堵塞了自流排水的去路，因此每到雨季积水不能顺畅排出，确实需要建一座电力排水站。他把调查来的情况向县委作了汇报，经过县委集体讨论，同意了冷子堡公社的建站要求。这件事使他感到，凭老经验办事，就会陷入主观主义中去，把工作搞坏。

他的切身经验，对县委其他成员启发很大。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的教导，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克服了那种认为在辽中工作时间长，情况熟，因

辽中县委领导成员认真看书学习深入调查研究

坚持运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指导革命实践

不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发展了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而忽视调查研究的倾向。从此，大家坚持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倾听基层干部和社员的意见，按照实际情况指导工作。平时，县委只留一名常委在机关处理日常工作，其他常委除开会以外，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基层活动。县委书记走遍了全县的二百四十六个大队，掌握全面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这个县的民权排水干渠是当地一个较大的排水工程，流程八十多里，经过四个公社。但是由于依靠闸门自流入河，雨水一大，下游大片良田经常受涝成灾。去年春天，县委在研究整修工程时，县委书记带领其他领导成员，深入现场察看地形，听取群众的意见。由于调查了实际情况，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就比较顺利地制定出了一个分级排水、机械排水和自流排水相结合的施工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各有关公社团结起来，共同修治，使工程又快又好又省地完成，群众感到满意。

辽中县委领导成员体会到，在运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指导革命实践中，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教导，善于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别是要抓住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才能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才不会迷失方向，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这个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有一部分后进队工作长期没有搞好。过去，有的领导成员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比较

多的是从生产上找原因，主张多从物质上给这些后进队以支援。后来，他们学习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后进队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大家认识到，后进队表面上是生产后进，实际上是阶级斗争尖锐复杂，而这些后进队的领导班子一般又不善于抓阶级斗争。于是，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委分别深入到这些后进队蹲点，对这些单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进行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肖寨门公社三台子，是全县最大的村庄，有一千七百多户，分四个生产大队，是有名的后进单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县里几次派人来这里帮助工作，但落后面貌始终没有多大改变。去年春天，县委的一名副书记来这里蹲点，他遵照毛主席关于“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的教导，访问贫下中农，多次召集党员、干部、青年开座谈会。他对得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进行细致的分析后认识到，这个村庄后进的主要原因，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尖锐复杂，而有些大队的领导成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各种错误倾向斗争不力。他根据群众的意见，联系本村实际，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提高了干部和社员的觉悟，挖出了隐藏的阶级敌人，进一步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干部、社员团结战斗，认真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使后进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去年在遭受水灾的情况下，四个大队的粮食平均亩产超过了

河流。汛期水面最宽处近十华里，流量三千多秒立方米。河道弯弯曲曲，由北向南穿过全县，河床不稳定，洪水一来就威胁大堤。过去，对治理辽河一直采取守、退、让的办法。先搞护岸，护不住就退，另修套堤，让出大片耕地和一些村庄，每年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个县的领导成员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一九七〇年四月开始了截直辽河弯道的第一次战斗，顺利地完成了辽河五里槽子弯道的截弯工程。

第一期工程完成以后，他们乘胜前进，又讨论制订辽河赵家截弯方案。这时，有人认为，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照样干就行了。县委针对这种思想，组织大家认真总结了第一次截弯的经验和教训。县委的一名副书记在总结中，肯定了第一次截弯的经验，同时提出了需要继续探索的新问题。他认为，第一次是四月份截弯，虽然是枯水期，但仍有六十多个流量，截流合龙的难度很大，需要高度集中人力物力，搞不好容易前功尽弃。还有没有比四月份更好的施工季节呢？大家觉得他这个问题提得好，感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并没有完结，如果把一次成功当成全部成功，就有可能陷于盲目性。于是，他们认真查阅辽河的水文资料，并且继续向群众作调查，终于发现，辽河全年枯水期中流量最小的是化冻之前一段时间，就决定第二次截弯在一九七一年二月份施工。实践证明，这个时期辽河的水不到五个流量，截流合龙比第一次容易多了。

第二次截弯以后，县委领导成员遵照毛主席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教导，总结了第二次截弯的经验，感到二月份天寒地冻，沙土冻得象石头，开挖新河道遇到不少困难，便确定第三次截弯，在晚秋结冰冻前挖好新河道，不引水，等初春化冻前截流合龙，再引水。去秋今春他们按照这个方案，又在夹河搞了第三次截弯，结果工程进展很顺利，省工省料，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

中共辽中县委由于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指导工作，发展了全县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全县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一年多来，全县已建设方田、条田、台田四十四万多亩，基本上改变了历史上“九河下梢，十年九涝”的面貌。去年，在外洪内涝的威胁下，获得了农业丰收，粮食亩产第一次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

周恩来总理、西娅德主席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会谈

西娅德主席等索马里贵宾由周总理等陪同出席文艺晚会观看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娅德今天下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

索马里方面参加会谈的有：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成员、公共工程部长穆·谢·奥斯曼上校，索

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委员、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顾问委员会成员伊萨克少校，外交部长加利卜，计划和协调部长马哈茂德，

委员会、中非友协今天举行文艺晚会，热烈欢迎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娅德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全体成员。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农林部长沙风，交通部长杨杰，中非友协负责人丁西林，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陈慕华、刘复之、潘友宏、韩叙、许寒冰、章曙、樊作楷、蔡坚、陪同西娅德主席等索马里贵宾观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

坦桑尼亚内政部长马斯瓦尼亚和由他率领的坦桑尼亚内政代表团成员应邀观看了演出。

演出结束后，西娅德主席等由周恩来总理等陪同，走上舞台同演员一一握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并赠送了花篮。

索马里、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也应邀观看了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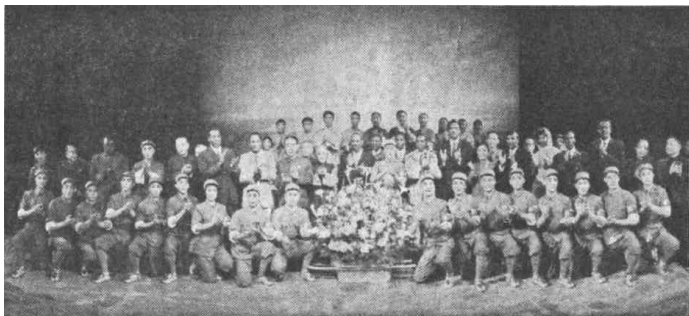


周恩来总理、西娅德主席举行会谈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演出结束后，西娅德主席等由周恩来总理等陪同走上舞台和演员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这是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周恩来、廖承志、王国权

会见日本公明党第二次访华团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副会长王国权，今天晚上会见了由日本公明党中央副委员长二宫文造为团长、副书记长大久保直彦为副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二次访华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公明党第二次访华团

成员是：鹤冈洋、多田时子、渡部通子、近江已记夫、中川嘉美、松尾信人、古寺宏、相泽武彦、金井俊和、石浦室一。

会见时在座的还有我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王晓云、肖向前、林波、金苏城、李孟尧、陈抗、单达圻、王效贤、周斌、孙浩元、赵钟鑫、蒋秀丽、王音。

坚持党的优良作风是执行正确路线的保证

——记中共湖北枣阳县委处处依靠群众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的事迹

领导农业学大寨运动，要有一个好的作风。有了好的作风，就能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搞好农业生产，做好各项工作。中共湖北枣阳县委通过一年多来的实践，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枣阳县委成立以来，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处处依靠群众，办实事求是，工作踏踏实实，领导全县人民夺得了革命、生产双丰收。去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七〇年增加八千多万斤，比历史上任何一年的收成都好。

不凭主观办事 坚持实事求是

在枣阳县，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指示深入人心，干部、群众人人头象盆火，都想快一些改变阳面的面貌。这种迫切的心情，极大地鼓舞了枣阳县委。他们看到兄弟单位都在大踏步前进，而枣阳面貌却变化不大，心里十分着急，下决心要在三、五年内改变枣阳的穷山沟、薄田地。但是，怎样才能把这种良好的主观愿望变为现实？开始，县委思想上并不清楚，他们曾经走过一段弯路。

前年七月，一位新来的县委负责同志到省里参加农村工作会议，落实种植计划。这位同志凭他曾在水稻区工作多年的经验，认为枣阳过去粮食产量低，就是因为没有大面积种双季稻。他觉得，扩种双季稻，是改变枣阳面貌的“捷徑”，便在会上报了扩种双季稻三十万亩的种植计划，准备鼓足干劲，在一九七一年打个农业翻身仗。

回到县里，这位同志把自己的想法和扩种三十万亩双季稻的计划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同意了。可是，

计划和各区负责同志一见面，都说有困难，县委就将扩种双季稻的指标降为二十万亩；再拿到各公社去，公社的同志们认为条件还不具备，县委又将指标降为十五万亩；第三次，交给群众讨论，贫下中农提了很多意见，于是，县委又将指标降为七万亩。最后，只落实了三万亩。

从三十万到三万，这引起了县委领导成员的高度重视。他们想：是群众保守，还是县委的计划脱离了实际？为了找到原因，弄清思想，县委负责同志分头到各社队进行调查。

一部分县委成员到了枣南，在座谈会中，区、社干部问：枣阳人少地多，机械化程度低，一季麦、一季稻都忙不过来，搞双季稻，农活集中在四、五、六、七几个月，这时也正是加强棉田管理的时候，劳力怎么安排？县委书记带着一些同志到了枣北。群众对他们说：枣北历来缺水，种了双季稻也得干死。要搞，就得先搞水利建设。再说，种双季稻，很多地方还是头一次，必须先作试验，取得经验，逐步推广。通过调查，县委找到了答案：不是群众思想保守，而是领导主观主义。群众的计划，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县委的计划，是凭主观想象产生的，脱离了客观实际。两种计划的产生，是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和搞唯心论的先验论两条思想路线的反映。从那里他们认识到，要较快地改变枣阳面貌，不仅要有冲天的革命干劲，还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二者缺一不可。他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光辉著作，批判了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为迅速而扎实地改变枣阳面貌扫清了思想障碍。

什么是改变枣阳面貌的正确途径呢？县委领导成员首先查阅了枣阳二十多年的气象资料和生产发展情况，发现枣阳夏粮作物历来产量低，冬春的雨量比较少宜小麦和杂粮作物的生长，增产潜力很大。他们了解到，枣阳小麦和中稻产量低的原因，都是缺肥。县委负责同志又分头到群众中去调查，寻找解决的办法。

他们来到刘庄和马庄，群众介绍说：我们一九六九年采取绿豆压青的办法，一九七〇年小麦获得丰收。刘庄的党支部书记还告诉他们：过去种中稻的田，实行冬炕（晒垌），地瘦产量低。一九六九年，他们把冬炕地改种兰花草和红花草作绿肥，中稻亩产一年就增长一百二十多斤；还解决了棉花、杂粮肥源不足的问题。

县委认为，这是群众经过试验证明是成功的经验，便组织推广。各社队干部认为符合本地情况，都积极照办。冬春季节，干部社员又加强了小麦和杂粮地去解决。安装水管的接头，需要一百多条麻袋覆盖，队里的麻袋都凑起来还不够。那治友想起小时候在河里抓鱼，用青苔包好，回到家里鱼还活着。他想，青苔这东西能不能代替麻袋？他同几个社员踏着冰凌，从河里捞了五车青苔，一试验效果比麻袋还好。第二天又捞了大批青苔，代替麻袋，节约了资金。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斗，一座扬程四十米的扬水站建成了。第二年，社员们又一致作工，建成了扬程二十二米的二级扬水站，修起了六里长的环山渠道，使全队百分之九十的土地浇上了水。

河水上了山，大队党支部书记那治友又带领社员展开了劈石整地建良田的战斗。广大干部和社员迎着困难上，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条件下，抡锤挥镐，搬石垒堰，干得热火朝天。正当大伙干得起劲的时候，工地上发生了一场争论。原来有半亩大的一块地，一块大卧牛石就占了三分之二。大多数社员主张要把它搞掉。有少数人却说：“这么一点地方，费那么大的力气不值得，可以躲开它。”这块地要不要整？那治友想：“今天丢一块，明天丢一点，怎么能在石碾顶上存高产！”老贫农那治喜豪迈地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别说这块卧牛石，就是铁山铁岭也要把它凿平。”通地讨论，大家决定把这块卧牛石搬掉。

那家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就是这样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大干了一个冬春，就是把山岗上一块块卧牛石啃掉。接着，大家又推着小车运，肩挑人抬，从山上取下好土，从河中运来黑泥，改良土壤，建造了几十亩高产稳产的大寨田。

胜利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打那以后，那家大队干部和社员农闲干大，农忙小干，常年不停，一个劲地整地造田。五年来，一共建设了三百二十亩高产稳产的大寨田，连年夺得高产。大寨红花遍地开。今天的那家大队变了样：山岗薄地变成高产农田，集体经济更加巩固。广大贫下中农看到这惊人的变化，无不欢欣鼓舞。现在，社员们正紧张地积肥、施肥，整地保墒，加强小麦田间管理，为夺取今年农业的新丰收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通讯员

作物的田间管理。去年全县夏季作物获得了大面积丰收，比一九七〇年夏季增产四千多万斤。秋季作物由于集中了劳力，增加了肥源，也获得了丰收，比一九七〇年秋季增产四千多万斤。一些不适宜种农作物的岗地，县委就组织群众利用冬闲植树造林。与此同时，他们为扩种双季稻积极创造条件。枣北缺水，县委领导成员亲自带领群众挖水渠、修水车、打机井。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枣阳就发生明显的变化。

枣阳县委从这里总结了一条经验：快字里面有科学。如果只凭主观想象，不顾客观条件，就会欲速不达，事与愿违；只有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积极挖掘增产潜力，才能又快又好，大步前进。

不图虚名 讲求实效

枣阳县委在工作中，发扬踏踏实实的作风，不搞形式，不图虚名，讲求实效。

去年，有个干部向县委书记提出，惠岗公社地处城边、公路边、铁路边，人来车往，上级负责同志经常来这里检查生产，是些“门面地”，要多下些功夫，优先搞好。

这件事引起了县委书记的深思：种地究竟是为了增产，还是为了好看？为图上报一时的表扬和过往行人的称赞，多给那里几台拖拉机，多拨点化肥，是可以搞好的。但是，多给了惠岗，就要挤掉别处。这种只图粉饰门面，不顾大面积平衡增产的想法和做法是要不得的。几年前曾有过这样一件事：

七方区有一个枯皮岗，土瘦地薄，紧靠汉襄公路边。有位领导干部坐汽车经过这里，见那块地种得不好，就下车进行了批评。有一个大队干部为了不受批评，第二年把劳力、肥料、良种集中用到公路两边的地里，这样，庄稼长得好，谁见了谁夸。但离公路稍远一点的土地却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总产减少，社员不得不吃国家供应粮。

想到这里，县委书记深深感到：“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是自欺欺人的不老作风，图虚名者，必得失败。他认为，应当在抓好全县生产的同时抓好惠岗，决不厚此薄彼。

县委领导成员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同时，还经常教育下面的干部，要讲老实话，办老实事，表里如一；发现不正之风的苗头，就及时进行纠正和教育。

去年夏收，寺庄公社吴庄一队小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面积丰收，其中有二十亩产量最高，贫下中农喜笑颜开。一个公社干部为了鼓舞大家的干劲，还没等小麦晒干，就宣布了二十亩小麦的单产为七百三十斤。另一个同志立即写了稿件，在区广播站广播。可是晒干一核算，实际只有五百九十六斤。

消息传到县委一个负责同志那里，他觉得，问题出在下面某些干部身上，责任在县平时教育不够。他决定亲自去找那个干部谈话。当时有个同志劝他说：这是件小事，过去了就算了。他认为：好的思想作风，要靠一点一滴地培养，决不能视而不见。他当天就来到寺庄公社，首先表扬了那里的工作成绩，然后耐心地教育那个干部说：一个共产党员，办事要严肃认真，向党、向人民讲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从党的优良作风，谈到不正之风的危害，教育了那个干部。那个干部表示：“我不但自己记取这个教训，还要用这件事帮助其他同志。”



中共枣阳县委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改进领导作风。

本报通讯员撰

中共枣阳县委，一年多来，在带领群众改变枣阳面貌的过程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既反对屈服于大自然压力的机械搬大思想，又反对脱离客观实际的蛮干。他们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本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和推广符合本地区区先进经验。他们的成绩正是实事求是的结果。实事求是态度，就是按照事物本身的规律去办事，这决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办到的。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束缚，可以根据主观愿望任意改变。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必须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也只有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把干劲真正落到实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短评



县委领导成员的身教言传，使各级干部逐渐养成一种良好的思想作风，有了成绩不骄傲，有了缺点不遮掩。

一次，县委组织部、社干部到刘庄参观水稻。只见田里的水稻秆叶茂，长势着实喜人。党支部书记介绍种植水稻的经验，也个个说得好。这时，党支部书记又有意地把大家领到另一块田边。田里的秧苗东一块，西一块，花花点点。有个同志问：怎么把大家带到这儿来？他回答说：“参观是为了总结经验，推动工作，不是为了好看。我领大家来帮找找原因，出出点子。”经过大家分析研究，原因是绿肥没有耙开，绿肥成堆的地方，把秧苗给“烧”死了。

这次参观，大家学到了种植水稻的经验，也学到了不图虚名、老老实实的思想作风。

现在，这样的好思想、好作风，在枣阳县到处可见。

不做“水浮莲” 脚踏实地干

枣阳县的干部群众，都夸县委领导成员是个“好领导”，干劲足，方向明，工作做得细，问题解决得透。今年年初，一个干部向县委一个常委反映了一个情况：耿集公社耿集大队第一队，去年生产搞得不好。区里要撤换队长，群众不同意。耿集大队是区委一位负责同志抓的点，可是，这个同志“挂帅”不“出征”，抓点不蹲点，只是派了一个一般干部去，住了几天，又卷着铺盖回去了。结果，情况不明，问题处理不当，群众有意见。这件事，对这位常委思想上震动很大，他想：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作风飘浮，就不可能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心中无数、情况不明，就去解决问题，必然要搞漏子、碰钉子。

于是，这位常委亲自到耿集一队，坚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向群众调查。贫下中农说：“咱们队长是个好苗苗，根子正，群众关系好，就是有点干吃亏的思想，劲头不足。”群众还告诉他，解决一队的问题的办法，不是换队长，而是换思想，要帮助队长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原因找到了，办法也有了。他组织队贫农找队长谈心，忆苦思甜，帮助队长提高觉悟。队长觉悟提高后说：“当干部要少想自己，多为集体。过去我考虑个人得失多，为集体操心少，这不对。”从此，他振奋了革命精神，积极带领群众投入了积肥、春耕的战斗。看到这些，群众非常满意，大队干部也很满意。那位区委负责同志说：县委领导的模范行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后，决不做“水浮莲”，要脚踏实地干。

在枣阳县委，这样扎扎实实地做工作蔚成风气。很多县委领导成员，为了使各项工作能够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不辞辛苦，深入调查，坚持把关定向。

去年冬天，太平区委决定在清凉公社修建一个容积三百立方米的书库，报请县委批准。县委接到报告后，并没有马上批。他们认为：作决定、办事情，不能粗枝大叶，粗枝大叶往往搞错；县委对兴修水库地方的情况还不了解，应先作个周密的调查和研究。第二天，县委负责同志到现场察看，发现地势比较平，如果修容积三百立方米的书库，就要淹掉上千亩良田。他们又查阅了当地的气象资料，发现雨量也不足，便修改了原来的计划，决定修个一百立方米的书库。

在县委的支持下，区委领导热情很高，几天工夫就动员受益地区的大部分劳力、物力，投入了兴修水库的战斗。看到这种情况，县委又想起了一个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既不能慢慢腾腾，也不能操之过急；既要搞长远建设，又要照顾当年生产，必须全面安排，决不能顾此失彼。他们又合理地调整了劳力、物力：一部分人在家积肥、备耕，为来年生产作好准备；一部分人兴修水库。由于方针正确，有效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只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就修好了水库。同时，各社队积肥也比往年多。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引导下，枣阳县委还在不断改进作风，不断向前迈进。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赞实事求是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想快一些改变本区、本运动中的面貌，为革命多作贡献。在这个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出现两种不同的作风：一种，是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按照客观规律提倡增产潜力；另一种，是只凭主观想象，不顾客观实际，勉强办一些实在办不到的事情，对农业基本建设，不考虑条件是否允许，片面地贪多求大，提之过急，推广外地经验不结合本地情况，而是生搬硬套，喜欢搞“一律化”，一刀切，结果行不通，甚至造成损失。这两种不同的思想作风，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的反映。有人把实事求是看作是“不敢闯、没有作为”，其实，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的人，才是真正没有作为的人。

中共枣阳县委，一年多来，在带领群众改变枣阳面貌的过程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既反对屈服于大自然压力的机械搬大思想，又反对脱离客观实际的蛮干。他们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本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和推广符合本地区区先进经验。他们的成绩正是实事求是的结果。实事求是态度，就是按照事物本身的规律去办事，这决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办到的。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束缚，可以根据主观愿望任意改变。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必须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也只有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把干劲真正落到实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他们发扬“穷棒子”精神，自力更生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胜利前进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

工农兵是文艺的主人

——批判文学艺术需要“特殊的天才”的谬论

解放军四八〇〇部队 景延堃

无产阶级怎样培养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这是关系着组织什么样的文艺队伍，贯彻执行什么样的文艺路线，由哪个阶级来占领文艺阵地的大问题。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部光辉著作中发出庄严指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形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行创作过程。”这就是无产阶级文艺家应当也必须走的唯一正确的创作道路。

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完全脱离无产阶级文艺的革命实践，别有用心地鼓吹什么“文学艺术……需要特殊的天才”。他们企图用唯心论的先验论的说教，排斥工农兵的文艺，反对革命文艺家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让少数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垄断文艺阵地，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服务。今天，我们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彻底戳穿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制造“特殊的天才”的黑幕。

一

我们并不否认“天才”。所谓“天才”，无非是比较聪明一些，才能高一些。问题是聪明和才能是从哪里来的？

被刘少奇一类骗子吹得神乎其神的“特殊的天才”，究竟是什么货色呢？他们的意思，无非是说，这种“天才”是某些特殊的人物的头脑里“天生”就有的。这种神秘的玩意儿一降临在什么幸运儿的头上，或者当某些特殊人物还没出世的时候就被上帝安置在他的脑壳里，他的头上就戴定了文艺家的桂冠。至于没有这种特殊的幸运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休想沾文学艺术的边。显然，这种“特殊的天才”，在人间从来就没有过，将来也永远不会有。

马克思主义从来承认精神的反作用，也不否认人们的才能是有差异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认为：一切精神的东西，都是物质的反映；一切知识（包括才能），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世界上不存在先于社会实践而天然存在的“天生之才”。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的才能的来源，也是这样的。一个完全脱离社会实践的人，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才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为了骗人，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给“特殊的天才”披上了一件外衣，叫做“特殊的条件”。他们宣扬文艺家“需要有一些特殊的条件”，例如所谓“音乐家的耳朵”，“画家的眼睛”，等等。我们知道，人们的耳朵、眼睛、肢体，以至作为思想器官的大脑，都是人类通过长期劳动实践而有了高度的发展的人体上的物质。虽然人与人之间在这些方面是有差别的，但人们在才能上的差别，主要不是生理条件的不同造成的，而是在社会分工中长期从事不同的社会实践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

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上，社会分工的发展，造成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从社会发展的过程看，分工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从分工这个社会现象一开始，它就包含着不合理的因素。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反动统治阶级为了保持这种有利于他们的不合理的分工，就夸大人与人之间的“原始差别”，炮制什么“天生之才”的谬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已经占了统治地位但阶级还没有消灭的社会，是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正在逐步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使工人、农民也能搞哲学、科学、文艺、哲学工作者、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能搞工业劳动、农业劳动。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无师自通”的“天生的好脑袋”呢？

为了骗人，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又给“特殊的天才”罩上了一层纱幕，叫做“特殊的艺术感觉”，或者说是“灵气”，“灵感”。他们信口雌黄地解释道：“思想的闪光，即所谓灵感，要抓住不放”。还说要使这种

“思想的火花”汇成“思想零件”，再“使这些零件逐渐装配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東西。”这就是“天才”的“创造”。他们把文艺创作说是“由精神到精神”的神秘活动，而根本不谈文艺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不谈文艺的社会作用。

其实，这些都并不是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的“天才”发明，而是对历来剥削阶级唯心主义美学的拙劣抄袭。俄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曾胡诌：“创作的主要源泉是深深隐藏在人的心灵中的。”“它是不可捉摸的，意识不到的。”在他们看来，“天才”呀，“灵感”呀，是“不可知”的，它属于“彼岸”世界——“神”的世界。这就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对于文艺创作源泉的反动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一切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相信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刘少奇一类骗子把“灵感”作为“特殊的天才”的标志，无非是要把这类“天才”宣扬为“救世主”和“奇迹创造者”，世界上难道真有这种奇妙深奥的“灵感”吗？根本没有那么回事。文艺作品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毛主席教导我们：“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则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离开了社会生活这唯一的源泉，就没有文学艺术，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艺才能。文艺家的才能，不外乎认识社会生活和表现社会生活这两个方面。剥削阶级的文艺家是如此，无产阶级的文艺家也是如此。不同阶级的文艺家来自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决定社会生活和表现社会生活，这里丝毫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文艺家在进行社会实践和文艺创作的过程中，有时在思想上会出现“计上心来”或“豁然开朗”的情况，这只不过是认识过程中的量变到质变、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现象。这绝不是什么天外飞来的“灵感”，也不是什么神秘的“启示”，而是合乎唯物论的反映论的一种思维活动。刘少奇一类骗子把文艺家说是没有“灵感”、善“神思”的“特殊”人物，完全是欺人之谈。

二

从历史观上来看，所谓“文学艺术需要特殊的天才”，也是用反动的唯心史观设计出来的一个骗局。

历史唯物论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说一切知识（包括才能）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也就是说，是在人民群众的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得来的。社会实践，决不是个人的孤立的实践，而是群众的集体的实践。世界上决没有什么脱离群众的斗争实践而孤独立存的“超群之才”。正如鲁迅说的：“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怪物。”

“卑贱者最聪明”。在人类历史上，一切文学艺术最初都是在劳动中产生出来的。劳动人民是有从事文艺创作的天赋才能的。在阶级社会中，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中也把文艺作为团结自己并同敌人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武器。只不过在剥削阶级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劳动人民被驱使去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实际上被剥夺了文艺创作的权利和条件；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被剥削阶级据为私有和加以歪曲，并被用来作为进一步剥削和愚弄劳动人民的手段。剥削阶级利用他们的权势，掠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成果，他们又必从事体力劳动而享受着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养尊处优，有时间，有机会得到专门的培养、训练而成为艺术家。于是，他们就自封为“特殊的天才”；而他又把文艺舞台上和文艺舞台下的人民群众诬蔑为“天生的愚蠢”，竭力加以丑化。“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太婆老太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在我国，这种历史的颠倒，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照耀之下，终于又被颠倒了过来。毛主席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工农兵成了文艺的天才。许多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包括工农兵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正是由于集中了广大群众在实践中产生的智慧，才显露出创造无产阶级文艺的才能。我们承认人的聪明和才能是有一定差别的。但是这种聪明和才能主要来源于社会实践，来源于群众。天才是群众、阶级、党的集体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的集中表现。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离开了群众，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而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妄图把被无

产阶级纠正过来的历史再颠倒回去，鼓吹什么“特殊的天才”，“超群之才”，就完全是承袭了剥削阶级的衣钵，充分暴露出他们的唯心史观的反动。

任何一个阶级所需要的文艺家，都是他们本阶级利益的维护者。无产阶级需要的，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家。毛主席说：“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居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尽管把所谓阶级的文艺喊得震天响，但他们所需要、所重用的，也只是能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资产阶级文艺家。

总之，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在认识论上，鼓吹“天生之才”，颠倒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在历史观上，鼓吹“超群之才”，颠倒了群众和个人的关系。他们就是在这种唯心论的谎言的基础上，建立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思想体系，以便从文艺领域入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三

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鼓吹“文学艺术需要特殊的天才”，还有一个阴险的目的，就是企图以此欺骗、腐蚀文艺工作者，要他们不用深入工农兵群众中，不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以便俘虏他们，利用他们。

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执行什么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的。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则是反动唯心论和唯心史观的体现。剥削阶级世界观的存在有几千年的历史，至今在社会上还有很深的影。文艺工作者要实践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胡说什么：“作者没有马克

思主义世界观……也可以真实地反映生活”，关键是

“一要有经验，二要有才能，三要有技术，缺一不可”。

他们所说的“经验”，并不是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经

验，而只是个人从事文艺创作的“经验”。他们的意

思，无非是说：只要是“特殊的天才”，就可以不必深入

工农兵群众中去，可以不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毛主席

在《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

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

察文学艺术”。有人认为：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会“破

坏创作情绪”，会使文艺作品“概念化”、“公式化”。对

于资产阶级的“创作情绪”，非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破

坏”它不可！不破坏它，它就必然要破坏无产阶级的创

作情绪，以至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那怎么能够容许！

文学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对于文艺工作

者来说，“源于生活”，就是要深入地参加工农兵的斗

争生活，“高于生活”，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改造自

己，指导创作，从而更高地概括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

律。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革命样板戏，深深扎根在人民

群众的生活，放射出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光辉；集中了

工农兵英雄的性格特点，塑造出一个个完美高大的无

产阶级英雄典型；历史地具体地反映了革命斗

争生活，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和普遍的教育意义。不

深入工农兵群众中去，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指

导，就不可能创造出这样高度的政治与艺术相统一，

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革命文艺

的典范。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文艺领域里的伟大胜利。同时，

也是对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鼓吹“文学艺术需要特

别的天才”，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可以真实地反

映生活”的谬论的致命一击。

历史事实早已雄辩地证明：所谓只有资产阶级的

少数“特殊的天才”才能从事文学艺术工作，而广大工

农兵群众没有文学艺术的才能，这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代

表人物的谎言和诡辩。《国际歌》这样伟大的作品是

什么人创作的？是工人。《东方红》这样伟大的作品

是什么人创作的？是农民。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的文

学艺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

伟大运动中，在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在与工

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广阔道路上，必将日益茁

壮地成长起来。工农兵群众的文学艺术和专业文艺工

作者为工农兵群众而创作的文学艺术，必将远远超

过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所鼓吹的“特殊的

天才”的文学艺术。让我们为工农兵的文学艺术的百

花齐放而欢呼吧！

斥“创作灵感论”

刘宗明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思想、理论、精神都是客观的矛盾运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离开社会实践，文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然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一伙，却疯狂地制造了种种诡辩，妄图抹杀这个基本事实。他们竭力将文艺创作神秘化，鼓吹文艺创作需要一种天赋的“才能”。有了这种天赋的“才能”，一个作家根本不要参加社会实践，只要关起门来冥思苦想，就会“灵感”爆发，“突然顿悟”。周扬还为此种“创作灵感”作了一个比喻：一大堆烧不着的湿草，“酝酿又酝酿，于是突然一下，完全出你意外地”，“火舌伸吐着，照得通天通红”。周扬的这套鬼话，无非在宣扬：文艺作品是“天才”们头脑中固有的或天上掉下来的“奇货”。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才能”不过是人们从社会实践中经过总结经验教训而得来的一种能力而已。革命文艺的创作，就是在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斗争中，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抓住本质的东西，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这种能力，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通过参加社会实践，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艺术实践等多种方式获得的。而社会实践，则是获得这种能力的

基础。

鲁迅先生说过：“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周扬等“四条汉子”本人

的大量毒草文章作品，也根本不是什么一生关在屋子里“悟”出来的，而是他们及其同伙的反革命活动在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请看，《赛金花》、《李秀成之死》、《丽

人行》之类的创作，不正是“四条汉子”及其同伙的反革命生涯的缩写，不正是他们叛徒、汉奸、反革命的嘴脸的大暴露，不正是他们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大表演吗？

周扬一伙鼓吹“创作灵感”是在“酝酿又酝酿”中“突然悟到”的。怎么酝酿呢？周扬大声呼喊：要“坚持十年寒窗无人问”！要敢于“冷落孤僻”！这是公开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伟大指示。这是要文艺工作者脱离社会实践，“闭门修养”，“修”成资产阶级的文人，“养”成“四条汉子”一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什么“十年寒窗无人问”！什么“冷落孤僻”！在我们今天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所谓“无人问”，就是要与工农兵隔绝，所谓“冷落孤僻”，就是那些反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家伙的一种阴暗心理的表现。这种所谓“创作灵感”，正是要炮制与工农兵闹反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周扬在大谈“天赋灵感”之后，煞有介事地说：“借用王国维式的表现法，叫做‘意境两忘，物我一体’。这是创作的最高境界。”“意境两忘，物我一体”！这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反动戏剧理论中的“从我出发”、“下意识创作”，是无独有偶，同出一轍的。“意境两忘”吗？这是自欺欺人。试问：你们“四条汉子”一伙，在炮制毒草的过程中，那一次忘记了反党反人民？很明显，“意境两忘”是用来骗人的。所谓“物我一体”，说明白一些，就是：整个世界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我”即世界，“我”即一切。这是彻头彻尾的唯我主义。宣扬这种“理论”，就是要作家放肆地表现资产阶级的极端腐朽反动的思想，制造出更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

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彻底批判“创作灵感论”，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深入工农兵，反映工农兵在我们伟大时代的伟大斗争。

巴勒斯坦突击队频繁袭击以色列侵略军

在戈兰高地、加沙地带、耶路撒冷等地重创敌人

新华社大马士革电 据巴勒斯坦革命力量总指挥部发表的战报说，巴勒斯坦突击队从四月二十八日到五月五日，在戈兰高地、加沙地带和耶路撒冷向以色列侵略军发动了六次袭击，使敌人遭受重大伤亡。

四月二十八日，巴勒斯坦突击队向在加沙地带德巴拉以南消灭了一支以色列巡逻队，击毁了以色列列车两辆。

四月二十九日，巴勒斯坦突击队向位于戈兰高地艾因伊曼的以色列阵地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歼灭了阵地上的全部敌军，并摧毁了一辆半履带车。

五月一日，巴勒斯坦突击队向耶路撒冷城內炸毁了一辆以色列列车。五月二日，巴勒斯坦突击队向在戈兰高地希什尼亚附近埋设地雷，炸毁了一辆以色列军车，炸死炸伤车上所有的敌人。

五月五日，巴勒斯坦突击队用火箭袭击了在戈兰高地上的两座以色列兵营，摧毁了停放在那里的几辆以色列军车，打死打伤许多敌军。

新华社大马士革电 据巴勒斯坦革命力量总指挥部发表的战报说，巴勒斯坦突击队最近在戈兰高地、加沙地带、

约旦河西岸和其他以色列占领区向以色列侵略军发动了十多次进攻，使敌人遭到重大伤亡。

在戈兰高地，巴勒斯坦突击队四月十八日袭击了在亚库萨的以色列阵地，炸毁了几座工事，打死打伤几名以色列侵略军。

十九日，巴勒斯坦突击队用火箭袭击了苏尔曼山附近的以色列阵地，摧毁了一辆军车和一个重机枪阵地，还消灭了一些敌军。

二十五日，一支巴勒斯坦突击队向阿布基沙尔附近的一个以色列机枪阵地发射了火箭，摧毁了这个阵地。二十六日，巴勒斯坦突击队向阿布基沙尔附近的一个以色列前哨阵地，摧毁了一辆半履带车，一辆运兵车，消灭了很多以色列侵略军。二十七日，巴勒斯坦突击队向哈米迪亚的一个以色列

列车营发射了火箭，炸毁了一座营房和一辆汽车，并使以色列军遭到一些伤亡。

在约旦河西岸，一支巴勒斯坦突击队四月十六日在伊德纳村以西向一支以色列巡逻队交火，打死打伤一些以色列占领军。



巴勒斯坦游击战士奔赴前线，袭击以色列侵略军。

新华社发

在加沙地带，巴勒斯坦突击队于四月二十三日用地雷炸毁了一辆以色列军车，消灭车上的全部敌军。

巴勒斯坦突击队四月二十日、二十七日分别在特拉维夫附近发动袭击，炸毁以色列一座政府大楼，炸毁以色列军车三辆。

恩克鲁玛博士葬礼仪式在科纳克里举行

杜尔总统和达达赫总统及各国代表参加

新华社科纳克里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四日电 加纳前总统、几内亚共和国总统之一克瓦米·恩克鲁玛博士的葬礼仪式五月十三日在几内亚共和国首都科纳克里举行。

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总理兰萨纳·贝阿沃吉和几内亚民主党全国政治局委员以及几内亚政府部长出席了葬礼仪式。

由加纳救国委员会委员本尼率领的加纳代表团也参加了葬礼仪式。

出席的还有应邀前来参加葬礼仪式的各国代表团团长和成员，其中有非洲统一组织执行主席、毛里塔尼亚总统乌尔德·达达赫，利比亚总统威廉·托尔伯特，刚果人

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穆迪莱诺·马森戈，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侯赛因·库勒米准将，塞拉利窝内副总统兼总理、易卜拉欣·科罗马，达荷美总统议会成员阿皮蒂，坦桑尼亚国会议员会议长亚当·萨皮·姆克瓦瓦以及马里、赞比亚、赤道几内亚、阿尔及利亚、埃及、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喀麦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斯拉夫等国家的代表。中国政府代表、驻几内亚大使韩克华也参加了葬礼仪式。参加葬礼仪式的还有一些非洲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表。

恩克鲁玛博士的灵柩安放在科纳克里人民宫主席台的正中央。葬礼仪式开始时奏乐并播放了恩克鲁玛生前讲话的录音。

塞古·杜尔总统在仪式上介绍了恩克鲁玛博士的生平。许多国家的代表先后致悼词。他们热情赞扬恩克鲁玛博士为加纳和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葬礼仪式举行了一整天。恩克鲁玛博士的灵柩是四月三十日在几内亚代表团的护送下，用专机从布加勒斯特运到科纳克里的。

据新华社摩加迪沙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电 索马里人民在坚持反帝反殖斗争的同时，正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努力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经济。

为了能独立地发展民族经济、打破外国垄断公司对索马里经济命脉的控制，一九六九年底，索马里政府接管了意大利资本经营的索马里航空公司。一九七〇年五月，又宣布把在索马里的外国银行、石油公司以及外资经营的摩加迪沙电力公司和乔哈尔糖厂收归国有。一九七〇年八月，索马里设立了香蕉生产和贸易全国委员会，取代了意大利香蕉公司，统一管理这项索马里出口总额三分之一的物资的生产和出口。索马里人民不仅敢于同殖民主义势力作斗争，而且有能力管理好本国企业。

为了贯彻自力更生建设国家的方针，索马里政府从一九七〇年九月开始在全国开展了“自助计划”运动和农业生产运动。在“自助计划”运动中，广大群众怀着改变祖国面貌和反帝帝国主义阴谋的决心，自己动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兴建了一批中、小规模适用的公益项目，如学校、医院、蓄水池、水井、商店以及数百公里长的灌溉渠和数百公里公路。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还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来领导“自助计划”运动。今年三月初，西亚德主席为新近在短期内完成的包括国民指导中心和菜市场等十三个建设项目的落成主持了授奖仪式。他在谈话中说：“有效地群策群力和集思广益，我们就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这些工程的建成，雄辩地表明，获得了独立的人民，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资源，自力更生地建设自己的国家。

在开展“自助计划”运动的同时，索马里政府正在实施开垦八千公顷土地的“突击计划”。一年多来，已开垦了四千三百多公顷的荒地，并在谢贝利河和朱巴河流域的乔哈尔、贝累特温、杰利卜和托格贾拉赫等地建立了“突击计划”国营农场。

畜牧业在索马里的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索马里政府采取措施，扩大牧场，并打井修渠，改善对牧场管理。各县还建立了兽医站，加强对牲畜疾病的防治，并举办训练班，培训自己的兽医人员。

在大力发展畜牧业的同时，索马里还强调发展农业。通过修建灌溉渠，改进耕作方法，试种水稻等粮食作物。鼓励牧民种树，扩大香蕉、甘蔗、棉花和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使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索马里政府和人民坚持反帝反殖以及为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和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而采取的上述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也正因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对索马里现政权十分仇恨，不断对它们进行颠覆活动和施加压力。但是，索马里人民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面前，没有后退，进行了坚决的反击。索马里人民通过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不断斗争，更加坚定了捍卫国家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意志。西亚德主席曾指出：“为了维护自由、尊严和主权，我们必须洒下自己的汗水为未来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道路。我们的事情，要我们自己来决定。”

几年来，索马里人民通过英勇的斗争，在政治上挫败了帝国主义一次又一次的颠覆、干涉阴谋，在经济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就。今天，他们一面高度警惕着帝国主义的种种新阴谋，一面努力地改变自己祖国的面貌而艰苦奋斗。

日本乒协和中日文化交流协会举行酒会

热烈欢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三日电 日本乒乓球协会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五月十二日在东京举行酒会，热烈欢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

日本各界友好人士约一千人出席了酒会。中国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人员赵自瑞、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傅仁、黄文钦和旅日爱国华侨应邀出席了酒会。

应邀出席酒会的还有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主席韩德律和副主席郑在源、洪凤珠等以及一些国家驻日本的使节。

出席酒会的日本各界友好人士有（按姓氏第一字笔划次序）：八百板正、小平忠、山本弥一郎、小林进、山崎谦、川渊一、户村一作、冈田春夫、木村伊兵卫、中村梅吉、田川诚一、白石凡、田村三郎、田英夫、安井正三、西园寺公一、村冈久平、坂本德松、佐佐木三三、松冈洋子、若井章、松村一人、春日幸一、城户尚夫、宫川寅雄、宫崎世民、宿谷荣一、菅沼不二男、渡边义雄、黑田寿男、渡部一郎、萩原定司、漆川肇、樱内义雄、额贺熏生、藤田茂等。

出席酒会的还有日本羽毛球协会理事长川端升市、日本排球协会理事长冈田英雄、日本游泳联盟会长田畑政治、日本溜冰联盟会长竹田恒德以及日本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山中教子、关正子等。

日本乒乓球协会代理会长、亚洲乒乓球联盟主席川上理三，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和促进恢复中日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藤山爱一郎出席了酒会，并在会上致词，欢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日本。

川上表示相信，通过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这次访问日本，必将进一步加深日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他说，不久前在北京成立了亚洲乒乓球联盟。“我们今后决心同中国、朝鲜合作，为使预订在今年九月于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获得成功而努力。”

中岛健藏说：“乒乓球虽轻，但日中两国人民之友谊重。”他指出，亚洲乒乓球联盟的成立，对亚洲体育界以及全世界所带来的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

藤山爱一郎在讲话中赞扬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的友好精神和崇高风格。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徐寅生对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将继续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为进一步增进中日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好团结，发展两国体育交流作出积极的努力。”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团长、副团长五月十二日上午拜会了亚洲乒乓球联盟主席、日本乒乓球协会代理会长川上理三，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并且在五月十二日拜会了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主席韩德律等负责人。

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瑞士客人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和于立群同志，今天下午会见了瑞士激进民主党主席、瑞士日内瓦州政府主席亨利·施米特及夫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马家骏、王笑一、周振东、罗旭、赵春胜等应邀。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耿飚部长会见并宴请美国朋友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讯 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今天会见并宴请由克拉斯斯·西里马、米尔斯率领的“美国和中国人民团结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

谈话。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冯友松、李肖白、邢仁先、林晨、邢竹芳、李骧、贾学谦、李瑞生、林成农、劳远回、潘世强等。

王国权会见并宴请比利时和英国朋友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讯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负责人王国权今天会见并宴请比中协前秘书长马尔·胡斯曼、英中了解协会副主席

鲁宾逊夫人和英国朋友伯杰先生，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和宴请的我有关方面负责人有李思求、常玉琳、董超、谢启美、刘光亚等。马尔·胡斯曼、鲁宾逊夫人和伯杰先生是分别于四月二十九日和五月一日到达北京的。他们在北京参观了工厂、学校、人民公社，并将到外地访问，然后回国。

鲁宾逊夫人和英国朋友伯杰先生，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和宴请的我有关方面负责人有李思求、常玉琳、董超、谢启美、刘光亚等。马尔·胡斯曼、鲁宾逊夫人和伯杰先生是分别于四月二十九日和五月一日到达北京的。他们在北京参观了工厂、学校、人民公社，并将到外地访问，然后回国。

分别接见我国政府贸易代表团

科威特国埃米尔萨巴赫和首相贾比尔

工商大臣阿达萨尼设宴欢迎我代表团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四日讯 科威特消息：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萨利姆·萨巴赫和王储兼首相贾比尔·艾哈德·费比，五月十三日分别接见了由外贸部副部长陈洁率领的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全体成员，并且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科威特工商大臣哈立德·阿达萨尼参加了接见。

接见时，中国驻科威特大使孙盛清也在座。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四日讯 科威特消息：科威特工商大臣哈立德·阿达萨尼五月十三日晚举行宴会，欢迎由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陈洁率领的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

出席宴会的有：科威特工商会主席阿卜杜·阿齐兹·萨加德，外交部次官拉希德·阿卜杜勒·阿齐兹·拉希德，工商部次官哈立德·哈拉菲，财政和石油部助理次官穆罕默德·阿达萨尼，以及科威特经济和商业界的知名人士。

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工艺品贸易小组的全体成员出席了宴会。中国驻科威特大使孙盛清和大使馆的其他外交官员也出席了宴会。

阿达萨尼大臣和陈洁副部长在宴会上先后讲话，共同祝愿两国之间的友谊和贸易关系日益发展。

宴会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日本佐世保工会活动家访华团到京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讯 日本佐世保工会活动家友好访华团一行十六人，在团长速见勉、副团长由布成人和秘书长西村畅文的率领下，今晚乘火车到达北京。

我有方负责人穗保书、许忠敬、李铁英、王东风等前往车站迎接。

访华团来京前先后访问了广州、长沙、韶山、上海、天津等地。

索马里依靠自己力量发展民族经济